

试析郑观应的市场观

黄 群

(遵义师专政史系, 遵义 503000)

郑观应是晚清“商战”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商战”思想的要旨就是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以实现富强救国。本文拟就郑观应“商战”思想中的市场意识和市场观作一透视。

一、在中外通商时代, 必须“以商立国”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外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进一步扩大和深入, 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与此同时, 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和发生了资本主义, 学习西方, 借法自强, 成为一种广泛的历史潮流。但是, 究竟怎样使中国富强, 各种社会力量的答案不尽相同。

早期维新思想家循着地主阶级改革派“开眼看世界”的轨迹, 进一步面向世界考虑中国的问题。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变局”是不可逆转的, “中外通商之举, 将与地球相始终”^①“道贵乎因时制宜”,^②中国的立国之道必须有所变通。郑观应指出: “欧洲各国, 动以智勇相倾, 富强相尚, 我中国与之并立, 不得不亟思控制, 因变达权,”^③“中国以农立国, 外洋以商立国, ……各国并兼, 各图利己, 借商以强国, 借兵以卫商, 其订盟立约, 聘问往来, 皆为通商而设”。^④中国居于这种万国竞事通商之世, 必须改变“以农立国”的基本国策, 采用“以商立国”的资本主义方式。并要“变隆古之习, 视商如士”,^⑤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这里所说的商人, 是指从事新式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就是说, 面对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郑观应主张采用新的生产方式, 树立新的价值观念, 跟上时代的步伐, 使中国走上真正的富强。

重农抑商思想是植根于封建农业经济的一种政治观念,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主导思想和传统国策。郑观应提出的“以商立国”、“视商如士”的主张, 是对旧的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挑战与突破,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起了不可磨灭的启蒙作用。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造成中国社会财富“流溢于外”, 郑观应认为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 中国将逐渐陷于“枯槁”, 会带来比军事侵略更严重, 更危险的后果。洋务派的“自强”运动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只是“图末”和“治标”, 并不能从根本上抵制外国的经济企图。“彼不思我之练兵识武, 特患我之夺其利权, 凡致力于商务省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 莫如振兴商务。”^⑥“我之商务一日不兴, 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⑦因此“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⑧就是说, 必须从经济上着眼, 大力发展通商以为自强之策, 通过贸易竞争的方式与西方列强争夺市场, 从而有效地抵抗外国的经济企图。

郑观应曾说: “商务者, 国家之元气也。”^⑨“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 农无商则种植之

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⑩这里，郑观应突出地强调以商为民之纳，但是其“商战”思想的核心并不在于单纯的商业贸易，而在于说明社会生产各部门的协调发展，在于强调商品生产是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还强调商品生产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各领域的广泛交流和价值考虑，其涉及的范围，包括了资本主义经济大市场的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属于现代市场学的基本研究内容，因此，“商战”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具有独特内涵的概念。“商战思想实质上是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资本主义市场观。

二、培育国内市场

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时，中国早已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成了西方列强的产品倾销地，原料掠夺地。郑观应呼吁以商为战，培育国内市场占领国内市场，抵抗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为此，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1. 兴办近代工业，“机器兴利”，“以工翼商。”在《盛世危言》一书中我们看到，郑观应的“商战”包含了商业竞争，但不是指单纯的争夺市场的贸易之战。他认为“西人之富，在工不在商。”^⑪“商务之盛衰，不仅视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⑫中国之所以在商战中处于劣势，是因为“制造不如外洋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⑬因此必须提高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加强中国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怎样才能“以工翼商”呢？郑观应提出：“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⑭中国“亟宜招商集款，购办机器，自行织造，擅其利权。”^⑮并进而提出中国“宜设专厂制造机器，……各种机器能自造，则各种货物亦能制造，所造之物即便自用，且可售于外人，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⑯

以上有关以工翼商，机器兴利的一系列主张，实质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将商业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求，提出了中国建立机器制造业的新课题。19世纪中叶起，工业化已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与社会经济的这一变革潮流相适应，工业化思想亦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主流。变革生产力，发展近代机器工业的要求在洋务思想中已初露端倪，而在郑观应“机器兴利”主张中更鲜明地表示出来。他的“商战”理论始终与大机器工业相联系，并试图从近代工业和商业的内在联系上把握工业化的发展过程。所以，建立近代机器工业并广泛地运用机器生产，是郑观应资本主义市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建立新型的官商关系。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新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初期以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形式为主。早期的工商业资本家曾对官督商办企业寄予希望。但当洋务企业弊端日渐显露，特别是洋务企业中的“官权”与商人“求利”要求不断发生冲突时。早期维新派发出“与民共利”，“官办不如商办”的呼声。郑观应则强调中国应有护商的良法，建立起新型的官商关系，“用官权以助商力。”^⑰并提出设商部、订商律、使“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⑱郑观应又提出官方应开放民间商办工业而不设任何障碍。“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外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⑲官方对商办工业的管理，应“仿西法颁定各商公司章程，”^⑳实行民主选举，成立商董会，赋之以管理企业的实权。“全以商贸之道行之，绝不拘于官场体统。”^㉑

要求政府实行保商政策，反映了近代民间工商业有独立投资能力和愿望的增强。显然，郑观应认为国家政权的力量对于培育国内市场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3. 广视角地考虑市场机制，形成市场网络。郑观应指出：“商务一端必须统筹全局，果

有把握而后行。”^②所谓全局，包括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方面面。

第一，掌握市场信息。从市场学的观点来看，市场需求在生产经营与市场实现的整个经济活动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郑观应有丰富的经营工商业的经验，非常重视掌握市场信息。他说有人认为：“商贾之事，只需略知贸易情形，即可追逐蝇头之利，”岂知欲“通商情”，不但须明旧日所传商政，并宜详求近日新法。”^③随着国际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场信息的内容和数量亦随之扩大，而且变化多端。因此必须及时了解市场风云变幻，作出准确的判断与预测。正所谓“逆料数月中之市场，”^④“知市面之兴衰，货物之增益，销路之宏远。”^⑤

第二，金融货币是市场网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892年，郑观应提出：“今为之计者，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⑥近代中国最早提出设银行的是洪仁玕，而对银行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的则是郑观应。银行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郑观应视之为“商务之本”和“百业之总枢。”^⑦并列银行之利十条：如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代筹企业资金”；“银根短绌，可籍本行汇票流通”^⑧等等。总之，都是为了解决商品生产和流通中资金短缺等矛盾。同时，郑观应主张中国自铸货币。铸币本身可以赢利，更主要的是可“便商民而维市面。”^⑨即加速商品流通，促进市场贸易。

第三，近代化的运输通讯，既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组成部分，又是形成市场网络的重要手段。郑观应提出要采用火车，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使商贾便于贩运，运费可助国用。贸易日旺，税饷日增。建立新式通讯系统使信息方便用时；边疆警报朝发夕至，进而还能有助于开启民智。

第四、不论是掌握市场信息，建立金融货币机构，还是发展新式交通通讯事业，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应用，而科学技术的应用，必须依赖于教育。通过教育，把科学技术传授给直接生产者，生产者掌握了科学技术，才能在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郑观应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⑩但封建的经书教义与科举制度，已经不能培养适应时势的人才了，所以郑观应力主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校，增添西学各科，诸如声光电化，天文地理，医药农政等等。改变往常那种“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状况，培养有用的人才并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市场竞争，说到底人才的竞争，郑观应说：“国之盛衰系乎人，‘人材济济，国势以强也。’^⑪

以上是郑观应在“以商立国”前提下，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培育与建设的通盘思考。将先进的机器技术，连同产生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都纳入所计设的经济体系之中，并明确提出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来促进生产，广视角地考虑市场机制。这表明郑观应重商保商，培育国内市场的理论与以商致富，商为国本和财富即金银的重商思潮有着本质的区别，是符合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具有进步意义和科学性的经济思想。

三、出洋贸易，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要实现富强自主，要进一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建立健全国内市场，更需要走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为此，郑观应提出了以下主张：

1. “彼既以商来，我亦以商往。”在近代，资本主义企图者利用一系列特权，将中国变成了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⑫其商品垄断中国市场，以致“耕夫馊妇，周体洋货。”^⑬郑观应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主要应在进出口贸易上与资本主义列强进行商品竞

争。“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以商往。”^④并且做到“必使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⑤当时外国输入中国的大宗商品是棉纱、棉布，“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⑥因此郑观应针锋相对地主张：“然既杜洋布之来，尤须自织洋布，以与抗衡……以塞来源。”^⑦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茶。郑观应指出：“首先振兴丝茶工业……，以争印，日之权。”^⑧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只要应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定能制造出比外国更价廉物美的商品，如此，“则彼货之流可一战而塞，”再把土产精益求精，运销外洋，“则我货之源可一战而徐开。”^⑨从此中国“则利权渐收，商途日辟。”^⑩所谓“商途”即资本主义大市场。

2. 自保利权，增强竞争力。外国列强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等一系列殖民特权，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市场竞争中总是居于劣势。郑观应要求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收回海关主权。英国人把持中国海关，“洋货入中国则输半税，土货出外洋则加重征。”^⑪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郑观应主张改派华人担任总税务司等海关主要职务，并实行关税自主，对本国工商业者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⑫这样通过政府的保护政策来抵挡外来商品倾销，为中国商品的买方市场兴旺创造条件。

3. 裁厘加征，华商洋商一律平等。华洋货物在税收上的不平等，是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严重入超的原因之一。当时外商在内地运货只交子口税，而华商则逢关纳税，遇卡抽厘。郑观应对此极为不满，他指出，应该裁撤厘金，加征关税（指海关）；内地贩运仍纳子口税，华洋一律征收。如此，一则中国收回利权，二则保证中外贸易双方税收平等，增强华商在市场竞争中的实力。

4. 设领造船，扶助华侨兴商。郑观应指出，“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其君相惟恐他人夺其利益，特设商部大臣以提挈纲领。远方恐异域耳目之不周，监察之不及，则任之以领事，卫之以兵船……无不百倍维持。”^⑬中国要出洋贸易，开拓国际市场同样必须“借官力为保护，”^⑭做到“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⑮同时还必须创设轮船公司，发展轮船交通，往来于世界各地，运出本国商品，转运外国商品，“是亦夺回利权之大转机也。”^⑯

另外，郑观应还非常重视华侨商人在开拓国际市场中的作用。他认为许多华侨虽已加入外国籍，“然皆奉大清之正朔，……倘中朝亦简派领事人员，显示抚循隐资控制，”^⑰华侨商人就可以中国为恃，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举凡外洋之货，我华人自营运之；中土之货，我华人自经理之。扩其远图；擅其利藪。”^⑱就是说中国政府应该鼓励和扶助华侨商人在海外兴商贸易，“凡中西可共之利，思何以筹之；中国自有之利，思何以扩之；西人独揽之利，思何以分之，”^⑲这样，郑观应说：“数十年后，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西欧并驾者，吾不信也。”^⑳

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初期阶段，郑观应可说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开拓国际市场的系列构想。能从宏观上把握资本主义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脉膊，使郑观应高出同侪，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思想的集大成者。

综上所述，由于近代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自身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进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变迁所呈现近特点是：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与资本主义新式工业产生和发展互相交叉地进行。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反映了两者兼有的特点。“商战论”把发展近

代化大机器生产作为发展经济，推动生产的始点，作为国家的富强之道，把商业贸易作为实现产品价值的手段，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了“通盘筹划。”因此，“商战论”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思想体系。而这一体系所凸现的市场意识和市场观已初具资本主义市场学的内涵，并成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理论的初步形成形式。

近代自资本主义产生之后，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一种一体化的趋向。从此，任何一国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市场。不管愿意与否，各国都必须以一定方式参与国际交流与国际竞争，这种竞争有时是政治的，有时是军事的，但最频繁和最根本的是经济文化的竞争。因此，任何国家要存在和发展，必须使自己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现代化。郑观应提出以反抗外来侵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富强救国为宗旨的市场观，从经济的视角突出了走向世界并自立于世界的强烈竞争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是激励和启迪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①王韬《弢园尺牍》。

②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③《易言·论公法》，《郑观应集》。

④《危言·商务二》。

（以下凡引《郑观应集·危言》只注篇名）。

⑤⑦⑧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商战上》。

⑥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商务二》。

㉑《商务一》。

㉒④⑤⑥《易言·论商务》。

㉓⑬⑭⑮⑯《商务五》。

㉔《危言后编》。

㉕⑥⑦⑧⑨《银行上》。

㉖《学校》。

㉗《学校·附录》

㉘⑪⑫⑬⑭⑮《商务三》。

㉙《商战下》

㉚《纺织》

㉛《商务》

㉜《税则》

㉝《救时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步大略》。

（责任编辑 袁廷科）